

不要忘记
阶级斗争



统一书号：T 3103·373
定 价：(5)一角四分

(AF 62/12)

目 录

必須补上这一課.....	1
一个社会 两种生活.....	4
地主发家的秘密.....	10
地主是怎样剝削农民的.....	17
地租剝削野蛮残酷	
高利滾滾吸尽农民血	
剝削雇工抽筋剝皮	
地主是怎样統治压迫农民的.....	37
仗勢欺人 胡作非为	
杀人飲血 慘无人道	
官紳狼狽为奸 农民有冤难申	
利用封建迷僧 欺騙毒害人民	
地主阶级不甘心死亡.....	51
牢記阶级仇恨 把革命进行到底.....	56



必須補上這一課

水有源，樹有根， 忆苦思甜不忘本，
牢記父兄血泪仇， 誓作革命接班人。

青年同志们，当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前辈，已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經過长期的艰苦斗争，赶跑了帝国主义，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，接着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，胜利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并且大大发展了社会

主义建設事业。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再受剝削階級的压迫和剝削，不再吃旧社会的苦头了。我们生活在新社会，成长在紅旗下，得到党和毛主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最大幸福。但是，就因为我们沒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、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的剝削和压迫，沒有亲身参加过对階級敌人的斗争，所以对劳动农民在旧社会受地主階級残酷压迫和剝削的痛苦，是不了解，或者是了解得很不够的。

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中，广大农村青年經過党的教育，听了老年人讲过去的苦难历史，看了新旧社会对比展览会等等以后，对旧社会的認識增多了，无产階級的觉悟提高了，对階級敌人的仇恨心加强了，无产階級的感情逐步浓厚起来了。但是总的說来，我们还懂得不多，了解不深，階級斗争的鍛炼还不够，这样，在现实的社会階級斗争的风浪中，就容易受資产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思想的侵蝕，迷失方向。因此，究竟什么叫旧社会？什么叫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？什么叫階級和階級斗争？对我们广大青年同志來說，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必須严肃对待的問題。

我们青年一代，是革命的接班人。我们担負的任务：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把革命进行到底，高举总路

綫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紅旗，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，为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、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，为实现一个沒有帝国主义、沒有資本主义、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。要把革命进行到底，要建設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，就必须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課。在社会主义教育中，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，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，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，提高阶级警惕，增长革命志气，坚决抵制剝削阶级思想的进攻和影响，永不变质，高举革命紅旗，奋勇前进！

为了使青年同志们进一步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认清地主阶级的罪恶，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，牢记阶级仇恨，我们以本省的情况为主，对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作些介绍，让青年同志们看一看地主阶级发家的秘密；看一看地主阶级究竟是怎样野蛮、残酷地剝削和压迫农民的；看一看在地主阶级的統治下，旧社会农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农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

一个社会 两种生活

月儿弯弯照九州， 几家欢乐几家愁，
几家高楼饮美酒， 几家流浪在外头……

一个社会，两种生活。地主住的是高楼大厦，穿的是綾罗綢緞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；广大貧苦农民，住的却是“千孔屋”，穿的“百結衣”，吃的糠菜粮。旧社会真是地主阶级的“天堂”，农民的“地獄”。

在旧社会里，我国的土地制度是极不合理的。“农民无寸土，地主田万頃”。全国农村的大量土地，被一小撮地主、富农霸占着。在抗日战争以前，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、富农，大约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；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、雇、中农以及其他人民，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。我们浙江省的情形和全国一样，到处都是无田少地的农民。就拿黄岩县坐应村来说吧，解放前，在全村的五百四十亩土地中，就被地主、

富农占去了四百另二亩，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四。占全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的六十户贫、下中农，总共只有二十五亩土地。新昌县甘湾村在土地改革时，全村一百十七户贫农，平均每户只有二分土地。新昌县长乐村，解放前一百十八户贫、雇农，只有一亩五分土地。

地主阶级霸占着很多好田好地，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。旧社会的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，就使地主阶级可以利用他占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，对无地少地的农民，进行种种盘剥，掠夺农民的劳动果实，榨取农民的血汗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而广大劳动农民，却被剥削得双手空空，过着无米下锅，无布遮身的悲惨生活。

武义县童芦村恶霸地主童维梓，吃的饭，是上等精白米；吃的菜，除鸡鸭鱼肉以外，还要吃最先上市的时令菜……。每餐吃喝，至少八菜一汤，一天伙食费，就要三百多斤稻谷。吃得稍不如意，还要打人、骂人。富阳县凤仪山村大地主马承发，家内专门造了餐厅、酒房和烧各种荤素菜的灶房，鲜鱼鲜肉、腌鸡腊鸭、桂圆荔枝、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。马承发自己，还把别直参磨成粉，当炒米粉吃；他母亲用人参汤当茶喝。很多地主还成天困在烟榻上，抽鸦片，吸白粉。

說到穿著，那是要綢有綢，要皮有皮，四季衣衫，无所不有。睏的是“千工床”“万工床”。“活閻王”邵展成专门叫人为他的第三个老婆做的“千工床”，共有三进：头进可以叉麻将、推牌九，二进是浴室，第三进才是紅漆鍍金的眠床。

地主住的也十分奢侈豪华。大地主馬承发的庄园，占地五十亩。庄园四周的围墙，打得严严实实。八字台門，



这是“千工床”的第三进。

好象一张血盆大口。三座宮殿式的大屋，有花厅、堂楼、书房、臥室、佛堂……和四座吞吃佃戶们血汗的大仓库。围墙里面，还有前花园、后花园……。这些高楼大屋，是强迫劳动人民花了十多年时间造

起来的。光花厅里的各种雕花，二十多个雕花匠就整整忙了七年。童維梓有了“三厅三堂”，还嫌不好，又强迫五百多个工匠，花了五年时间，造起一座日本式的四层楼房，当地的农民把它叫做“閻王殿”。地主阶级为了建造这些“閻王殿”，不知吸尽了劳动人民多少血和泪啊！

地主阶级逢到红白事，就更加挥霍。馬承发为他母亲做一次寿，吹吹打打，摆酒席，又麻将，整整闹了三天三夜，花去的钞票折合稻谷十三万斤以上。他父亲死后做丧事，花去的钱，折合稻谷也有十多万斤。我们如果算它每人每年吃粮五百斤，那么，这十多万斤稻谷就可给二百个人吃一年。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嫁女时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，陪嫁的是什么“金桌面”“百床被”等嫁妆。所谓金桌面，包括金碗、金酒杯、金碟子、金调羹各八只，金叉、金刀各八把，金筷八双，金酒壶两把，金面盆一只。百床被中，就有八条鸭绒被和十多条丝棉被。这些嫁妆所花的钱，折合稻谷就相当于当时潜川地区的四年粮食总产量。

在地主阶级的一个个阴森森的封建堡垒周围，广大农民却在世代代给地主做牛做马，过着饥寒交迫、典妻卖儿、家破人亡、流落他乡……的悲惨生活。

解放前，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，黄岩县坐应村七

十九戶人家，就有五十多戶討飯度日。就在大地主馬承發尋歡作乐的富阳县，何家、坂里村二百十二戶貧雇农当中，就有一百四十九戶人家，过着“糠菜半年粮”的生活，有六十三戶人家，常年采野草、摸螺螄充饥。其中討过飯的，就有十七戶人家。說到穿，村里有四十九戶人家，十年中就沒有一寸布上門。寒冬腊月，很多农民沒衣穿，无被盖。貧农何永雪，一家五口，靠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件破蓑衣和一条破棉絮，度过了十七个寒冬。何永雪的妻子穿着破单衣挡不住风寒，只得从破棉被里挖出两块烂棉花来，貼在胸口和背上过日子。



这是鎮海县三山公社貧农柯明来祖孙三代穿了九十多年的破褲。

在何家、坂里村，很多农民“下无寸土，上无片瓦”。村里有四十一戶农民，常年借住在祠堂、庙宇和牛栏里避风躲雨。貧农何木董，一家三代住在破庙里，“擂鼓門（晒

匾当大門)，笔杆墙（六谷稗当墙壁）。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，每年被活活餓死、冻死在路边、破庙的，真不知有多少人……。

碰到了灾荒年头，广大农民更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了。例如一九三四年，本省有二千多万亩田地受旱。受了灾的农民只能挖草根树皮糊口。孝丰县很多农民，被迫用船载着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运到城里卖给富家当佣人。永嘉县有一个农民，因为饥饿难忍，啃着自己手上的肉充饥。结果是血淋淋地痛死了。常山县有一户姓江的农民，全家十五个人，眼看受旱以后，田里颗粒无收，生路断絕，全家都服毒自杀，死了七人。号称“天堂”的嘉兴地区，成批农民被逼走上“讨饭船”。开出去时载的是人，回来时已是一船船的死尸，大批农民活活餓死、病死……。

“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！

土地农民开，粮食农民种。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土地和财产？生活上的大量花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让我们在下面进一步揭穿这些秘密吧！

地主发家的秘密

白骨堆上砌高樓， 地主肥来农民瘦，
一戶发家成財主， 千万尸体填荒沟！

旧社会的地主“老爷”们，就是在农民的白骨堆上筑起了自己的“天堂”，在农民的血汗中享受着“荣华富贵”。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敢承认这笔“血腥帐”。有的地主說，他们发财致富，当老爷、太太，是因为他们“命”好，祖宗坟上“风水”正；或者說，他们起先是“勤俭”发家，后来才享福的。这难道是真的嗎？绝对不是，这都是地主阶级騙人的鬼話。现在我们就来查查地主阶级的家底，看看他们的发家秘密到底是什么。

翻开“活閻王”邵展成的发家史，就可以看到：解放以前，邵展成霸占着二千一百多亩水田，二千多亩山地。他是怎样起家的呢？原来邵展成的祖父“老閻王”邵开富从舟山搬到临安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多少家产。后来，他巴

結上当地的王秀才，娶了他的独生女，捞到了十多亩田地和一笔家財。他就用这点老底，放高利貸、收重租、雇长工……，剝削“老本”也就越来越多。邵展成的父亲驕脚瑞庭，在高利貸盘剝上是个有名的“鉄算盘”。“老閻王”和“鉄算盘”心毒如砒霜。他们把誰家缺几个月粮，誰家什么时候断粮，統統記在帳本上。到五荒六月、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就开始出借粮食。出借时要农民拿田契房照作抵押。該值一百元的，只借你五十元，讲好第二年还錢贖契，叫做“死头活尾”。产权已捏在他们手里，但是又給你留下一綫贖还的希望。如果借的人第二年还不出，那就“洋不起利，田不交租”。到第三年再还不出，那末就要逼你“交契管业”，田地房产完全变成姓邵的了……。他们就是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高利貸的剝削方法，吞吃了农民的大量田地和房产……。

再看看紹兴任家坂恶霸地主任家“六老虎”的发家史吧：“六老虎”的父亲临死时，留給六只老虎的遗产是十八亩土地和三間房屋。可是到了解放前夕，这一門恶虎就已霸占着二百四十多亩土地和十九間大房……。这些财产哪里来的呢？在抗日战争时期，“六老虎”一面与国民党反动派通气，一面与日伪軍勾結。这些财产大都是他们



“大老虎”任应林派狗腿子来强迫任金花在“借契”上画押，
……金花全家就被赶出了家门。

倚仗恶势力，用打家劫舍，坐地分赃，强霸硬占，迫写绝契，拉白工，吃白食……等手段掠夺来的。例如任金花的丈夫死了，穷得买不起棺材，她只好托人卖田。那知问来问去，谁都推说不要。原来“六老虎”早已看中了任金花的三间房子和十亩田，并暗中放出空气，不准别人买任金花的田。结果“笑面老虎”任应林，强迫任金花接受了五十元伪币的借款（这点钱只够买一口薄皮棺材），后又派人来逼着她在写好了的“借契”上画了押。“借契”上写着：限约二月（截止端午节午时）本利缴清，不得拖欠，防恐到期本息不清，愿将自己祖遗田十亩六分、房屋三间作为抵押。到了端午书，金花全家就被赶出了家门。“六老虎”还开了个赌场，强迫农民赌博，骗取农民的血汗。凡是被“六老虎”拉到赌场去赌钱的，十赌十输。青年农民任阿泉被“六老虎”拉去打了两记“牌九”，全部家产就“输给”了“六老虎”。第二天，“六老虎”就没收了阿泉的三亩田契，封锁了他家的三间房屋，把他和他的两个弟妹一起赶出了门。阿泉从此弄得倾家荡产。这群恶虎，只要看中了农民的东西，还常常以“借用”为名，迫使农民出借。东西一拿到手，就“永借不还”了。……这就是“六老虎”发家的秘密。



“鳥飞十里，歇的是余家树；人行百里，走的是余家路！”

乐清县芙蓉西厝村余鼎三，是由大官僚变为大恶霸地主的。余鼎三曾当过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中将师长，代理过十九军军长。在作官任上，他仗势捞到了不少钱，到乡里用低价吞吃了农

民的三百多亩田。由于当地山多田少，这点田产当然填不满这个大恶霸的欲望。于是，他一回到乡间，就贴出“封山条例”，霸占了芙蓉地区所有的“官山”，不准当地农民上山砍折一根柴草。余鼎三霸占这片山地后，坐上一顶特制的沙发轿子，亲自察看了十多天。最后狂喜地翘起大拇指说：“鸟飞十里，歇的是余家树；人行百里，走的是

余家路！”宣布从这天起，为了名符其实，将自己的名字改作“余鼎山”。

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看出，地主阶级的“万贯家财”，主要是依靠下面两种手段得来的：

第一种是剥削。“荒地本无主，田地农民开。”粮食和棉花也是农民种出来的。地主阶级四体不勤、坐吃山空。地主阶级的万顷良田，就是通过雇工、放高利、做投机生意……等剥削手段，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。依靠剥削发家，这就是地主阶级发家的一种方式。

第二种是霸占。旧社会是“富家田园强家山”，农民的财物就是官府和地主的“口中肉、掌中物”。在旧社会里，那些当官的人，往往倚仗着自己的权势、地位，用贪赃枉法，敲榨勒索，诬良为盗，谋财害命，霸占祠堂、学校公产等等罪恶手段，大量掠夺民财和田地。在清朝，有些当官的人还曾经采用过“跑马圈地”“没边照”（也叫“满天飞照”）“鸣锣圈地”等野蛮方式，把大片土地圈入自己的庄院。仗势霸占，这是地主阶级发家致富的另一种方式。

这是地主阶级发家的两种主要方式，而每种方式的具体办法，又是花样百出，手段很多。巧取和豪夺是紧密地

結合在一起的。俗話說“不是霸和刮，地主哪得發！”一語道破了地主階級發家的秘密。地主說自己“命”好，說自己是“勤儉發家”的，完全是胡說八道。有些地主說他的產業是祖傳的，這也是騙人的鬼話。因為他祖宗所以會變成地主，也絕對不是“命”好和“勤儉”，前面說過，地是農民開，糧食是農民勞動耕種出來的，一切財產都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，為什麼他們祖上能占據那么多的土地和財產呢？追根究底，還是用剝削和掠奪手段，從農民身上搜刮來的。

通過剝削和掠奪發家；成了地主以後，又進一步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掠奪。這樣地主的田地家產，就越來越大；農民的田地也就越來越少，最後貧困破產，流離失所。所以，我們說地主的發家史，就是農民的破產史，地主階級就是踏着農民的血淚和屍體爬上去的。

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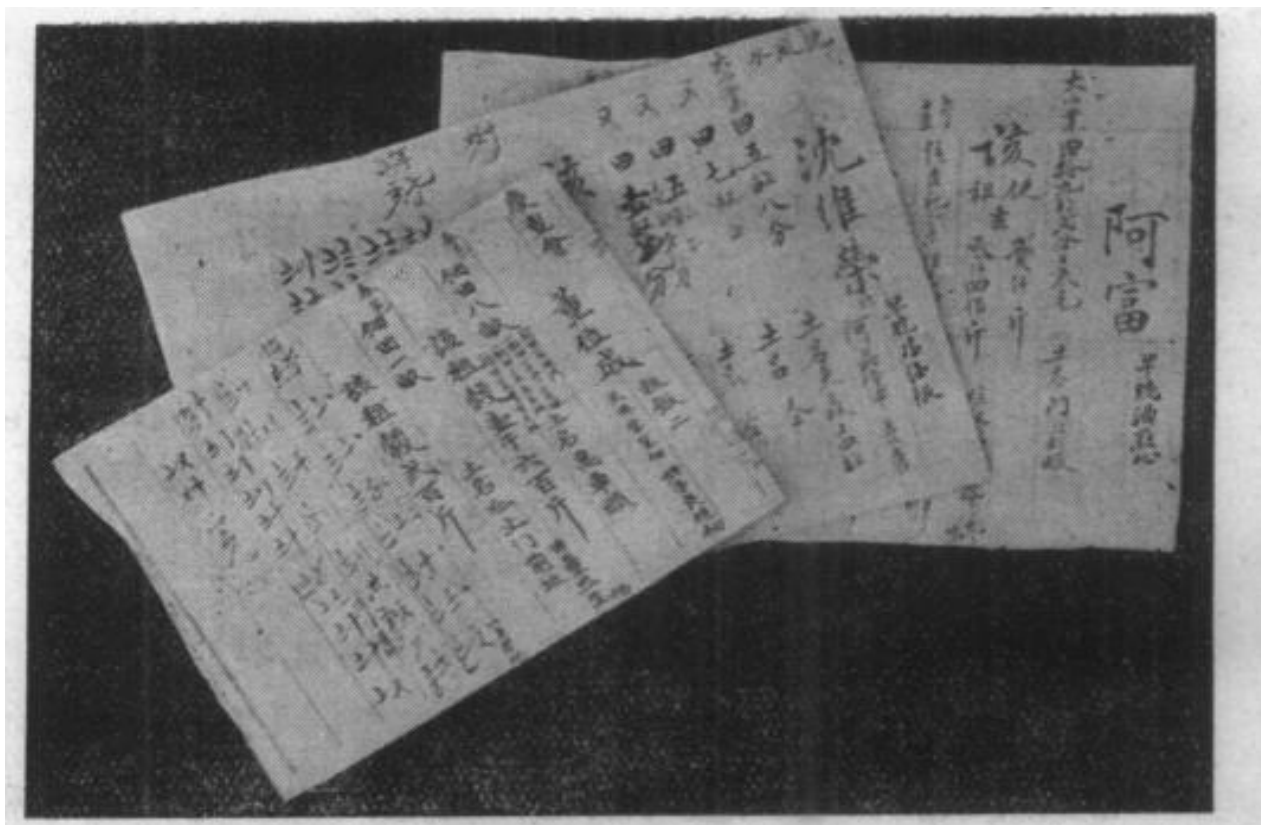
地租剥削野蛮残酷

滿田谷子滿腹愁， 佃戶耕种东家收，
地主单忧粮仓窄， 农民腸断无处求。

地主阶级霸占着大量的土地，通过出租土地，用地租方式来残酷地剥削农民。地租的花样是很多的。解放以前，我们浙江各地常见的有定租、分租、预租、劳役地租、空头租等等。

定租：有的地方叫板租，有的地方叫死租。就是租子定下来后，不论荒年或歉年颗粒不能短少。租额重得惊人，一般要占到每亩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。农民耕种这种租田，即使不遭灾荒，一年辛苦到头的血汗，交了租子，除去肥料等农本，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了。

据原丽水城镇第十行政村调查，解放前，村里最好的



这是地主的租簿的帐页。帐页上，甚至连租型、租饭等附加剥削，也写在佃户名下。

租田，平均每亩只能收三百五十斤谷，如果再把副产品收入折成一百斤谷，那么全部收入也只有四百五十斤。耕种这样一亩租田，租谷却要交二百斤，将近总产量的一半。再除去每亩田生产成本一百七十二斤谷。那么，农民辛苦一年，做死做活，得到的只有七八十斤谷。

富阳县凤仪山村贫农陈培根，种了地主馬承发的十一亩板租田，每年要交租谷二千三百六十斤。一九四六年，

因为連續遭受洪災和旱災，无力交足租谷，要求緩期补交。地主馬承发却逼着他說：“沒有糧，人也好！”当即派狗腿子把他的女儿搶去当了头抵租。接着，馬家又把全部租田抽回。最后，还把陈培根一家赶出村外。

分租：就是地主根据土地好坏划分等級，定出每亩田地的收获量，确定地主分几成，佃戶分几成；也有看年成好坏来决定分租的。分租的租額也很重，多数是“倒四六”（地主得六成，佃戶得四成）或“倒三七”。象原临安专区的地主就是采用“倒四六”、“倒三七”的。縉云县分租租額更重，一般为“倒三七”，甚至有“倒二八”的，就是地主得八成，佃戶只得二成。

預租和押租：地主怕农民交不起租，在出租土地以前，要农民先交一年地租，这叫預租。富阳、新登等县的一些地主，甚至先要农民交上两年的租米做預租的。有的地主在向农民出租土地时先收一部分押金，这叫押租。有些地主巧立名目，把押租叫做“桩錢”。鎮海县恶霸地主董协浙出租每一亩土地，每年要向农民收三斗稻谷现金的“桩錢”。“桩錢”名义上虽然规定到期归还，但是地主常用各种借口，到了期使农民仍然拿不到手，即使拿到手，也因为那时伪币常常跌价，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农

民。鎮海县柵下村貧农童宏順，一九三五年为了交二十元“桩錢”，他和儿子給人打了一百工短工。可是第二年拿回来时，因为物价飞涨，这二十元錢已买不到一包香烟。

地主向农民收了預租和押租，他们就既不怕佃戶欠租，又不怕佃戶不接受苛刻的承租条件，还可以用它来放高利和吞吃农民的田产。貧困农民为了交付預租和押金，往往只能受着地租、高利貸的重重盘剥。例如，奉化县中奉鎮农民周阿龙，在一九四六年秋天向地主租了一亩八分田，預交租子三百五十斤。到一九四七年秋天，又得預交下一年的租子。周阿龙交不起，地主就逼他写借单。到一九四八年，周阿龙收割了早稻以后，就拿五百二十斤稻谷还地主的債，把欠下的又重新写了借单。結果是利上滚利，三年中，連預租加利息，周阿龙总共要交給地主一千四百八十三斤半谷。可是这一亩八分田的三年实际收获量，总共也只剩有一千六百五十斤。

劳役地租：就是地主在出租土地时，规定佃戶在农忙季节无代价地或半价給地主出几天工。象于潛、新登等县的地主就规定佃戶要在农忙季节給地主出四、五个工。富阳县何家、坂里等地的地主則规定佃戶在大忙季节，要先給地主做十四、五个“泡头工”（紧要工）。秋收时，还

要佃戶合家上門，替地主家擗六谷包、縛六谷把、磨粉、舂米……。每天做到深更半夜，筋疲力盡，白白地替地主做工。有的地主租給农民田，却要农民作长工或作短工来抵交租子。

空头租：就是虛加亩分、多收租谷。很多地主有两本“土地登記簿”：一本是以多报少，專門为了完“錢粮”用的；另一本以少折多，是向农民索取“空头租”用的。有的地主为了多收地租，甚至把場地、屋基、河界、岸界都算在田亩之內。嘉兴县新塘乡小陆家浜农民陈双全，租种崔姓地主九亩五分田，地主却要他按十二亩田交租。

“轉租”：就是“二地主剝削”。二地主自己沒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一部分土地。專門靠从大地主那里租进土地，又用更高的租額轉租給农民，从中进行剝削。农民种了这种租田，等于要交納两份地租，受双重剝削。

地主階級凭着占有的土地，除了地租剝削以外，还有种种額外剝削。例如：

有的地主出租土地时，硬逼佃戶請“中人”和“代笔”写田契。写田契时要佃戶請酒送礼，甚至索取“小租”，把家里管事人的开支也摊到佃戶头上。余姚县恶霸地主邵恂儒，出租每亩土地，要額外加收“小租銀”七、

八角。上虞县大地主王蘋塘，规定佃户必须每隔三五年换一次田契。每换一次契每亩租田要交银币半角。他家有一万四千多亩土地，换一次田契，就可捞到七百多元银洋的额外剥削收入。

有些地主还定有一套“陋规”：每当秋收前，地主带着狗腿子下乡“估租”，要佃户杀鸡、买肉，供给好酒好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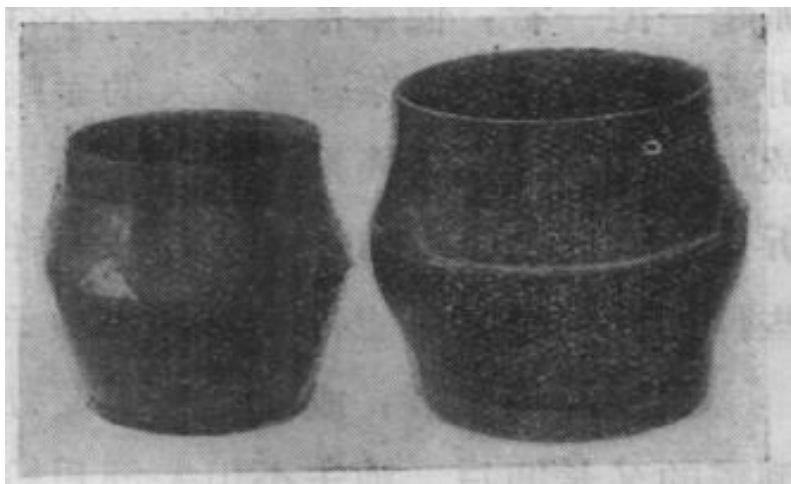
秋收时下乡逼租，同样要佃户杀鸡买肉，供给好酒好饭。杭州市郊区恶霸地主翁生茂，每年到佃户家收租时，要佃户备好两餐酒菜，他去时还把大嫂、小嫂、大舅、小舅等都带去吃喝。有的地主甚至在租契上给佃户开好“菜单”，规定要吃多少鸡鸭，

地主翁生茂还把大嫂、小嫂、大舅、小舅等都带去吃喝。

多少肉，吃什么样的菜和吃什么样的酒，等等。

另外，地主阶级在收租时，还采用大斗大秤，筛、扬、扇等一套手法来进一步剥削农民。诸暨县枫桥赵家地主王昭华收租时用的“加三斗”，比市斗就要大三升。余杭县乾元乡地主袁坤龙所用的收租斗，每斗足足有一斗一升。富阳县地主何维木用的大秤，每百斤要大十斤。地主王泽如所用的“活箍斗”，收租时把铁箍放大，每斗大二升五合，放债时又把铁箍放小。地主汪家镇所用的“活底斗”，斗底板能装能卸，一进一出要相差二升。地主姜醒吾的“四面收租秤”，看秤的里花每百斤大十六斤，看外花大十九斤，看上花大二十斤，看下花大十六斤。地主张长泰的秤，秤锤上有二个铁圈，收租时将铁圈加上，放债时将铁圈取下，这样一进一出，每百斤就要差八斤。

恶霸地主邵展成收租时用的风车是特制的六叶风车。这种



右边的大斗，是诸暨县枫桥赵家地主王昭华收租用的“加三斗”，比市斗要大三升。



……“不行，是潮谷，再打九五折。”

风车撮起来风力特别大，撮过的稻谷粒粒饱满。在收租时，他总是命人先用六叶风车一撮，然后伸手插进谷簾，抓起一把一看，便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是花谷，要打九五折！”再把谷放在茶盞那么大的手磨里一碾，把碾出的米放进嘴里一咬，又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是潮谷，再打九五折。”这样几个折扣一打，再用大斗一量，农民还能剩下些什么呢？最多只能付牛耕米和种子谷了。

至于逢年过节，或者地主家要办什么婚丧喜事，那末倒霉的又是佃户。地主不但要佃户给他当帮工，作牛马，还得要佃户送礼贺喜。有的地主甚至在租契上附带规定，每年要佃户送田鸡田鸭等等。恶霸地主童维梓就规定，佃

戶每種一畝以上的租田，每年要交一只二斤以上的田雞或田鴨，輕一兩也不行。這個地主每年單從佃戶身上刮來的雞鴨，就有幾百只以上。

以上說的是地主階級採用各種地租方式和額外剝削方式，對農民進行殘酷地剝削，下面我們再讲讲地主階級怎樣進行高利盤剝。

高利滾滾吸盡農民血

閻王債，一還三，利上滾利連連翻，
賣田抵屋把債還，世世代代還不完。

地主階級除了用地租方式殘酷地壓榨農民的血汗外，還乘人之危，將剝削得來的錢物放給農民，榨取高利。

象地租一樣，在高利剝削上，地主階級也挖空心思，想盡了花招。解放前流行在浙江農村的高利貸，真是名目繁多，花樣百出。這裡就舉出幾種來說一說：

“買青苗”：解放前，在“三春”“六月”青黃不接的季節，農民因為生產上要下農本，生活更加困難，只得把還沒有成熟的庄稼賣給地主，這就叫做“賣青苗”。當農



解放前，地主常常在青黄不接季节，用低估产量和杀价手段，买进青苗。

• 26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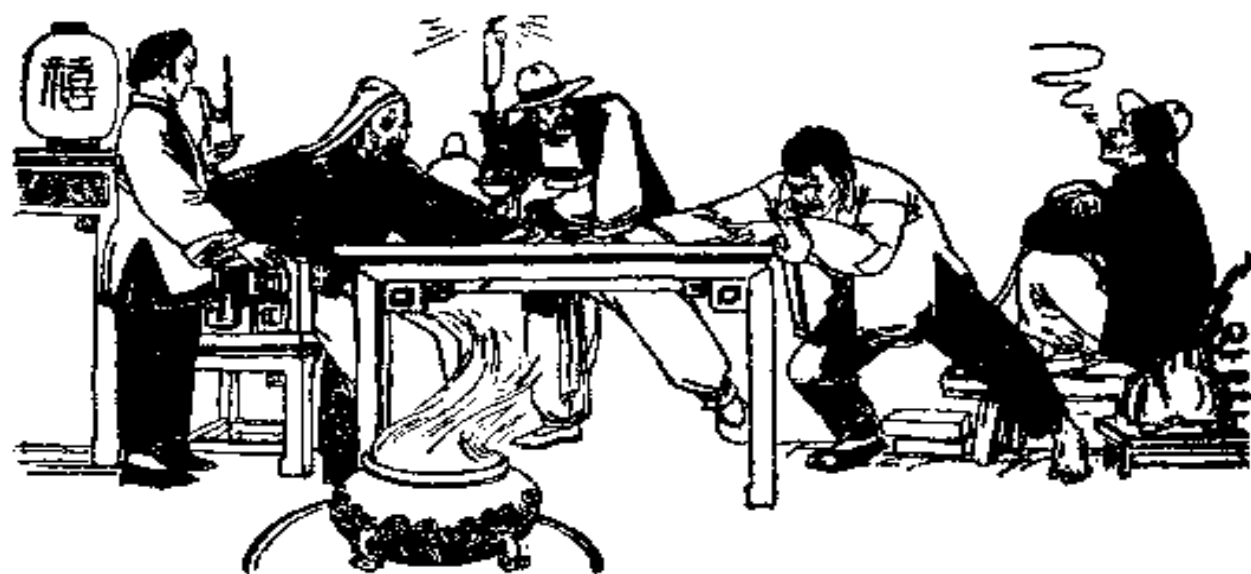
民危急关头，地主就趁机用低估产量和杀价手段，买进青苗，就叫做“买青苗”。诸暨县长山村大地主何邦坤，每年要放一万五千多斤米和二千多元钱高利贷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青黄不接时“放青苗”的。和这种剥削方式相类似的，在蚕区还有“买青桑”；出产桐子的地区，地主、富农和投机商人在春荒时，还把稻谷贷给农民，要农民还给高出稻谷

价格好几倍的桐子。武义县俞源公社俞源生产大队贫农俞樟清，他在解放前春荒时节，向地主俞品鈞借了一百斤谷，到了秋天要还给地主一百五十斤桐子。这一百五十斤桐子当时可换稻谷四百斤。在解放前的金华专区，高利贷的利息高得更是十分惊人，春荒时地主一般要加几倍利息，才肯将稻谷借给农民。

“滚雪球”：也叫“滚滚利”或“连利滚”。这也是解放前地主阶级普遍采用的一种高利盘剥手段。这种高利贷的计息期限很短，有十天一期，也有五天一期的，利息往往很高，有每一块钱每一期加五角利息的，也有超过一倍的。

诸暨县长山村贫农何旺福，穷得只有一亩桑园。他为生活所迫，去向村里的大地主何邦坤借钱。何邦坤想吞没他的桑园，眉头一皱，便对他说：“旺福，你人穷家贫，不是我不借，实在怕你日后无力归还。”旺福不得已，只得将桑园押给了地主。当时何旺福从地主手中只拿到十二块钱，结果本上加本，利上滚利，不上几年，一直滚到了八十九元。这个大地主就趁此吞没了他的桑园。

临安县潜川公社上沃村农民陈阿余，为次子娶媳向地主邵开富借了三十元钱。邵开富看中了他的房子，故意一



……阿余只得忍痛伸出发抖的手，在地主写好的文契上盖了指印。

直拖着不催，直到六年后的大年夜，地主派狗腿子把陈阿余叫去。邵开富说：“阿余，媳妇也耐啦，孙子也抱啦，欠我的钱，你知道连本带利多少了，五百元啦！”阿余一惊，还是屈服地说：“五百元也要还！”邵开富连连冷笑地说：“不要再硬啦，还是把你那三间两厢楼房抵给我吧！”陈阿余开始不肯，狠心的地主竟威胁阿余说：“不拿房子抵，当晚还现钱，不然不准出门，立即送官法办！”一直相持到半夜，陈阿余没法，只得忍痛伸出发抖的手，在地主写好的文契上盖了指印……。

“随涨不落”：也叫“听涨不听落”。地主放债时，

如果借出的是米，就按当时的市价折成錢；如果借出的是錢，就把它折算成米。农民还債时，如果米涨就以米算，外生米利；如果米落就以錢算，外生錢利。富阳县貧农潘阿庆，在一九四五年青黃不接时，向地主馬承发借了一石谷，折价五千元。一到新谷登场，米价大跌。馬承发就趁机上門逼債，連本带利，要潘阿庆立刻归还七千元現錢。当时这笔錢好买十石谷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“出門利”（即錢一借出門，即使是半天內归还，也得算一期的利息）、“撞撞利”（春借一斗，夏还二斗，秋还三斗，一年翻上好几番）、“借米还工”、“借錢还工”、“借六谷还黃豆”等等花样。临安县恶霸地主陈罗珍，有一次借給梁志福四斗米錢，却要他做五十五个工抵償。在一九四七年陈罗珍又借給梁志福一万元伪币（当时只能买二斗米）。第二年梁志福却給她做了一百三十个工，可是陈罗珍还无理地对他說：“再做四十工，才能勾銷上年这笔帳。”

地主階級就是用以上这些高利剝削形式，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。过去受过高利剝削的老一辈人都这样說：农民借了地主的高利貸，好比“雪天穿簑衣，越穿越重”，也好比毒蛇纏身，脫不了身。可见这种剝削是如何残酷的了。

剝削雇工抽筋剝皮

农民失地两手空， 无路可走当长工，
一生受尽牛馬苦， 惨死涼亭破庙中。

在地主階級的重租和高利貸的盤剝下，許多农民被地主階級盤剝得只剩下一双空手的时候，他们只得被迫給地主、富农当长工，作短工；很多貧苦农民的子弟长得还不到牛腿那么高，就开始替地主看牛、牧羊，过着苦难的小长工生活了。

长工一到地主家做工，就丧失了人身自由，成了地主日夜管束下的奴隶。地主要长工出的是“牛馬力”，給长工吃的却是“猪狗食”。黃岩县焦坑公社涼棚岭大队社員、共产党员叶根土，在十三岁的时候，就跟着哥哥，远离家乡，到嘉兴七星桥給地主做小长工。他回忆那时在地主王度六家做小长工的苦难生活时说：“我在王家，每天要管两条大水牛，还要烧飯、晒谷、喂猪……。每餐早飯都得在四更天烧好。烧好飯就得牵着两条牛去吃草，直到天墨黑才能回来。白天起碼要做十六个钟头生活，晚上，

我睡在死臭的牛栏边，蚊子又多，不能好好睡。夏秋两季，日子长，不准睡午觉。冬天寒风刺骨，我穿不上棉衣，盖不上棉被，夜里只好裹着稻草睡，冻得牙齿格格响，手脚生满了冻疮……。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把我折磨得生起“黄胖病”来，我那里来钱医呢！到第二年五月，大便也出血了，路也走不动，可是凶狠的地主还说我是假装的，经常打我骂我。我回到家里，娘见我病得这个样子，抱着我嚎陶大哭……。”

地主压榨长工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，他们恨不得把长工骨头里的油都榨出来。绍兴县恶霸地主叶其锦，一年四季，不管农忙农闲，或是晴天雨天，总是逼着长工起五更出饭，天墨黑才收工。收工回来，还要每人点着灯给他舂好一斗五升米。不要说平时不让长工休息，就是连过年过节，也不让长工松口气。地主既不让长工回家去睡，又不让长工睡在屋里，就在田间搭个草棚给长工栖身。有的地主还强迫长工住“抬铺舍”。这种铺舍只有六尺长、二尺宽，是用几块破木板钉起来的，顶上盖点草，可以抬来抬去。平时放在地主门口，要长工给地主看门守家，收获季节，就抬到田头地里，要长工给地主看管庄稼和瓜果。住在这种特制的“牢房”里，夏天热煞，冬天冻煞。杭州市笕桥



等到长工天黑收工回来，“活阎王”就将他们关进阴森森的下房。

水墩村地主俞启丰怕长工偷偷休息，常常不声不响，暗中跑来监视长工。有时他在茶店里坐到太阳快落山了，却拖了把锄头，装模作样地下地和长工们一起做“生活”，要长工们做到很迟很迟才歇工。“活阎王”邵展成压榨长工的手段也很毒辣。他家雇有二十六个长工，每天天不亮，就赶着长工下田干活。等到长工们天黑收工回来，为了不使长工闲着无事消耗体

力，影响第二天的劳动，就将长工关进阴森森的下房，不让他们自由活动。

凡是给富阳县凤仪山村地主馬承发做过长工的，都说在馬家做长工，比牛还辛苦，比狗还不如。馬家的牛还能夏忙冬闲，日耕夜息。做长工的却是天天起早摸黑，长年累月，得不到休息。馬家养的两只恶狗，吃的不是肉汤拌饭，便是油沸镬焦。长工们常年吃的却是粗菜杂粮、冷粥冷饭；年糕要酸臭得连狗也不要吃了，再给长工吃。长工们吃饭的时候，地主婆还要坐在一旁监视，看谁吃多了，便破口大骂：“我一餐连个鸡蛋黄也吃不了，你们要啃三四大碗，真是牛肚皮……。”

降低工价、克扣工资，是地主阶级剥削长工的又一种花招。地主往往串通起来，用“解雇”等手段来威胁长工，不断杀低工价。有时就专门雇用小长工。因为雇用小长工工资便宜，叫他多干一些活也不敢讲话。解放前，物价一日三涨，地主常常从这个“涨”字上打剥削算盘。即使他们和长工讲定了工价，也总是一拖二赖，象羊拉屎一样，另另星星付给长工。在诸暨县长山村，凡是给恶霸地主何永宁做过长工的，十有八九没有拿足工资。何全德给何永宁当长工时，讲定每年工资是四百斤谷。可是一

到年終結帳，何永宁見他年幼可欺，便硬說他“生活勿到家”，只付給他一百二十斤谷，尅扣了二百八十斤。

长工们生活这样辛苦，就是拿到几个“卖命錢”，也养不活家口。有的长工做了一世也討不起老婆，成不了家。有的长工，当他们被地主階級榨干了油，吸光了血，啃光了肉，折磨得体弱力衰的时候，便被一脚踢开，活活病死，活活餓死……。嘉善县“长工村”的老长工杨幼林，今年已經七十岁了。他从十岁开始，接連替地主做了四五十年的牛馬，却一直是一个光身汉，討不起老婆。这个村里的长工的身世比杨幼林更可怜的还有的是。比如拿大近江和小近江兄弟俩來說吧：大近江年青的时候是一个活蹦活跳的小伙子。地主看他力气好，就把重头生活都压在他身上，逼着他去做。当大近江因为劳累过度，未老先衰，地主看到“罌糠里榨不出油”来了，就将他一脚踢出門去。大近江回到家里无米下鍋，想想难以活下去，就在一个晚上上吊死了。他的弟弟小近江，也是一个苦长工。三十岁上得了重病，被狠心的地主赶了出来。他回到家里請不起医生，又沒有人照顧，也活活地病死了。象大近江和小近江这样被地主榨干了血汗，又被活生生逼死的，在“长工村”里并不是一人两人，一戶两戶。有人計算了一

下，在短短的十五年里，全村四十户人家，被地主逼死的长工就有十三、四人。当时这个“长工村”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謠：

长工苦，长工苦，	当了长工黄莲苦；
养不起爹，养不活娘，	讨不起老婆一世孤；
年青力壮象头牛，	病老时节无人顾，
地主阶级心肠狠，	一脚踢出无活路。

地主阶级除了通过象上面讲的那些残酷手段，对农民进行剥削外，另外还在城镇上开设各种店铺，进一步吸取农民的血汗。杭州市笕桥水墩村地主杨掌高，除了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外，还先后在弄口街上开了酒店、米店、肉店、药材店、杂货店、酒坊、织机坊、桑叶行、毛竹行、柴炭行、蔬菜地货行等十多种店行。各种店行的门牌，占了弄口半条街。附近的农民从农产品出售，生活用品的购买，一直到生病吃药，都要受到杨掌高剥削。同样，“活阎王”邵展成也在临安西乐堰、桐庐、杭州等地，开有各种商店。凡是佃户的土产，都要低价卖到他那里去；佃户们的竹木，就得卖到他设在桐庐、杭州的木行里去。农民借了他的稻谷，他常常以谷折菜子，菜子折谷的办法，翻

来翻去，把大量菜子刮进他的油坊。这种商业剥削和其他各种剥削形式结合在一起，农民遭受的剥削，也就更加重了。

地主是怎样統治压迫农民的

地主官府两相通， 奸淫燒杀虎狼凶，
横行霸道无天日， 血債累累罪行重。

在黑暗旧社会里，地主阶级为什么能够这样残酷地剝削农民呢？一方面，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；另一方面，还因为他们有反动的国家政权。他们用一套反动法律，对劳动人民实行种种限制；同时，还运用大量的军队、警察、法院、监狱等暴力机关，镇压人民的反抗，维护他們的統治地位，巩固他們的剝削制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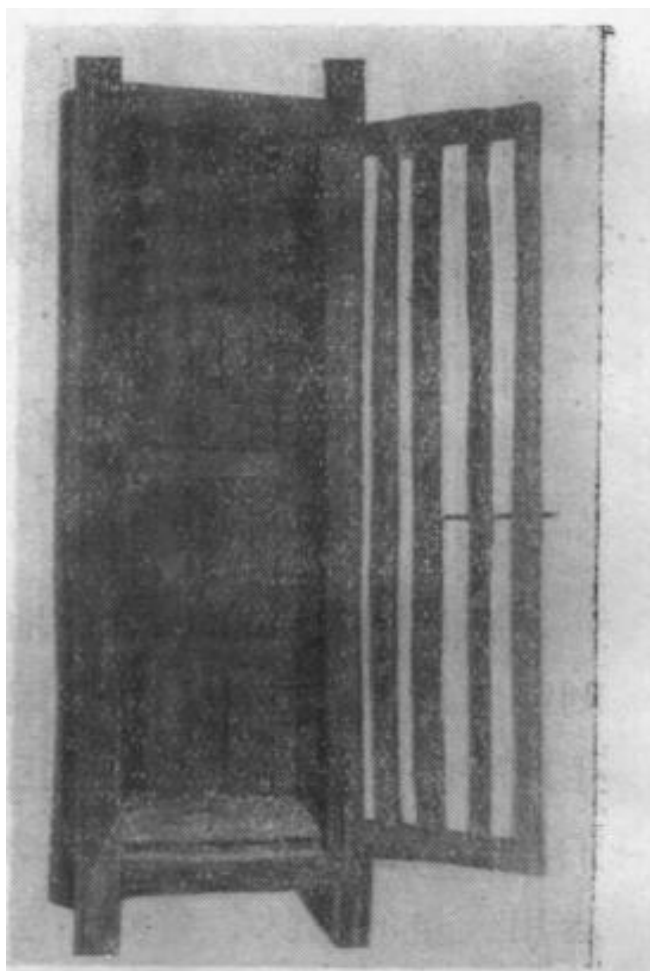
有不少地主还豢养爪牙，私設刑罰，私立公堂，称王称霸。地主阶级依靠这种权势，胡作非为，对农民实行种种残酷的迫害，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，欠下了累累的血債。

仗势欺人 胡作非为

在旧社会里，統治阶级完全剝夺了农民的政治权利和

人身自由。农民連說句話、走步路，也要受到地主階級的管束。在平时，要是一不小心觸犯了地主，那就会大禍臨身。紹興縣任家畝的“六老虎”，強迫农民任因虎做白工。任因虎迟了一步，就當場被“四老虎”打得昏倒在地。臨安縣的“雌老虎”陳羅珍強迫农民俞洋海的妹妹同別人結婚。俞洋海不服，跑去跟“雌老虎”評理。“雌老虎”不問青紅皂白，將他吊在柳樹上，用藤鞭打得重傷而死。鎮海縣惡霸地主偽鄉長王守挺等

人，不斷上門敲榨农民王亦信的錢物。王亦信忍無可忍，罵了聲土匪，就被地主的狗腿子告密，問了“滿門抄斬”的罪名。最後不但東西被搶得精光，而且還花了一千七百元所謂“免罪費”，托人再三講情，才免得一死。



這是天台县地主賈九妹逼租用的站籠。站籠里，三面是鋒利的鐵釘，下面鋪着生石灰。

要說出門走路，那时有誰吃了豹子胆，敢大搖大擺地走过地主惡霸的大門。鎮海县张家湾的一个农妇，因为走錯了路，穿过钟家湾小惡霸郑庆生的竹园，就被他抓去尝尽了“老鷹飞”等酷刑，打得遍体重伤。临安县的老农民彩生老头，一次挑了灰担，在路上不小心碰了一下“雌老虎”陈罗珍。“雌老虎”当场大发“淫威”，抓住老头打了三个耳光，拔了他的胡子不算，还罰他跪在地上賠不是。

在地主階級的心目中，农民的命还不如他们家里的恶狗。“活閻王”邵展成的娘“老閻婆”死了，他就要佃戶



“雌老虎”陈罗珍拔了他的胡子不算，还罰他跪在地上賠不是。

們統統披麻戴孝，給他家做孝子。出喪那天，他強迫一千多個佃戶排成長長的隊伍，跪在路旁，給他娘送葬。不管白髮老翁和吃奶的小孩，誰也不能逃過。象這一類不平的事，在舊社會里還不算是什麼奇聞。更駭人的是，有的地主竟強迫農民給他家的惡狗當孝子。溫州地主葉廉夫的一條惡狗咬了農民黃寶祥，被黃寶祥打傷了。地主葉廉夫知道後，就立即抓住黃寶祥，要他把狗抬到當地的歐海醫院去醫。黃寶祥出了醫藥費，沒有把狗醫好。地主就強逼黃寶祥替狗做坟，給狗披麻戴孝送喪，擺三桌酒賠不是。余姚縣惡霸地主邵恂儒養的惡狗，經常到農民鮑明強家偷東西吃，一次被鮑明強看到，用土槍打死了。邵恂儒就強迫鮑明強夫妻二人替狗盛棺材，還要他們披麻戴孝，一路哭叫“狗爷爷”，送到五里外去安葬。

仗勢強奸婦女，任意霸占農民妻女，也是地主階級的一大惡行。紹興的“六老虎”，就是一群有名的淫棍。不管哪個婦女，只要被他們的狗眼看中了，那就難以逃出他們的魔掌。“六老虎”之一的任老五，一次看上了在外做工的任張雄的未婚妻，強占了她的身體不算，還身帶凶器，氣勢凶凶地說：張雄回來，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休想活着回去。吓得張雄一直在外，不敢回家。據不完全的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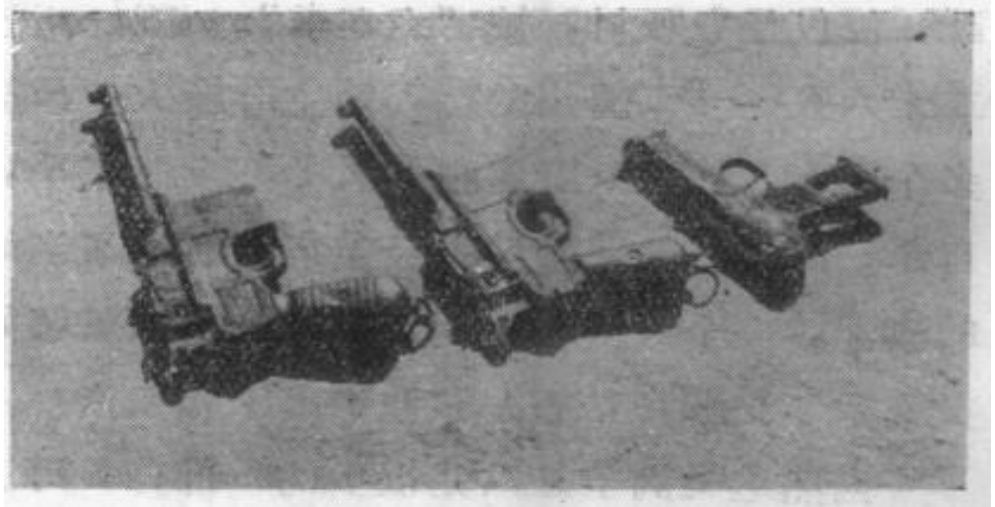
計，仅仅任家畝村，被“六老虎”一門奸污过的妇女就有二十六人之多。溫州的惡霸地主叶廉夫，曾經强奸过三百多个妇女。被这只野兽强奸过的妇女怀了孕，就会被逼着自杀。海盐县的惡霸地主金宝华，看中了当地农民沈順观的妻子，一个大白天，当着她丈夫的面就强奸了她。事后又枪杀了沈順观，霸占了他的妻子和家产。

当然这类例子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可是我們談到这里，已經抑止不住心头的怒火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世界，旧社会就是这样暗无天日野兽横行啊！

杀人飲血 慘无人道

誣良为盜，仗势抓人、打人、杀人，这是地主階級的“家常便飯”。“打死一个穷老，算得了什么？”这是地主“老爷”们的口头語。紹兴县任家畝的“六老虎”，就是一群专门仗势欺人、吊打农民的吃人“老虎”。当地的农民金长旗，因为在“六老虎”霸占的魚塘里捕了几条小魚，被“六老虎”毒打一頓不算，还被倒浸在河里，淹得半死。他们打了金长旗，还要金长旗請酒謝礼，并且威胁他說：“要不然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农民任伯云为了不愿替“六老虎”作証去誣賴好人；任九斤曾为“六老虎”霸

占魚塘同他們打過官司，“六老虎”對他們一直懷恨在心。後來，“六老虎”



這是“活閻王”邵展成所用的一部分短槍。

勾結官府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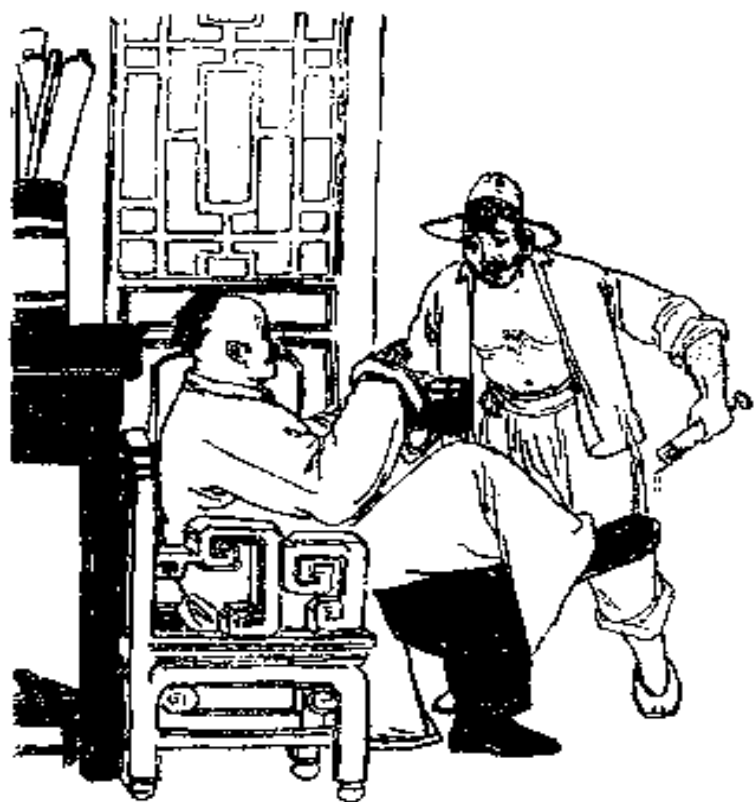
把他們抓進了監獄。任伯云的弟弟也因此被抓去當了兵。

臨安縣潛川地區，在“活閻王”邵展成竊占時期，不知被他殺害了多少無辜的農民。真所謂“閉門家里坐，禍从天上來。”東樂堰農民林順喜在田里割麥，他剛直起腰來想歇歇氣，便被過路的“活閻王”所帶的“保衛團”誣作土匪，不明不白地給一槍打死了。分水縣一個農民到新登去買小豬，因為走錯了路，到了七坑村，也被“活閻王”抓去，誣指是共產黨派來的密探，進行嚴刑拷問，後來，就這樣無緣無故被他殺害了。里伍村農民孫秀旺、孫秀雲兄弟在山里種六谷，再也沒想到突然會禍从天降，被“活閻王”誣為土匪，抓到“活閻王”私設的“公堂”上，用冷水、燒酒、辣椒水灌鼻子，嚴刑逼供。後來，孫

秀旺还被送到伪于潜县政府，屈打成招，关进监狱。余杭县乾元乡的恶霸地主袁坤龙，强迫农民沈阿见的身强力壮的儿子当小长工，沈阿见不允，袁坤龙就诬说沈阿见偷他的西瓜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抓去毒打了一顿。后来又用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、压大石板等大刑逼供，弄得沈阿见皮开肉绽，七孔流血。结果，沈阿见的儿子还是被袁坤龙抓去当了小长工。

更残忍的是：

东阳县的恶霸地主胡立茂为了“滋补”身体，竟拐骗了许多穷人家的孩子，暗地里绝灭人性地将他们活活杀死，当场抽饮鲜血。还有一个官僚地主赵昭泰，也曾偷偷地挖过十六个人的心肝，烤干了给他老婆当补品。



恶霸地主胡立茂为了“滋补”身体，……竟当场抽饮鲜血。

地主階級在旧社会里就是这样残酷地压迫和残害农民的。这些血的史实，反映了农民在旧社会里所遭受到的难以想象的苦难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記的血海深仇！

官紳狼狽为奸 农民有冤难申

青年同志们：你们讀了这些血的史实，一定人人切齿，个个痛恨。有的可能会說：“地主这么凶暴残忍，为啥不去告他们！”是的，在旧社会，有很多农民兄弟，因为受不了地主階級的欺压和迫害，曾經三番五次地告过状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“堂堂衙門八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。”“农民千张状紙，也抵不上地主的一句話。”旧社会的法律就是保护地主階級利益的，旧社会的法院、監獄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农民的。

你们看过“洪荒图”的戏嗎？这戏的故事就发生在清朝光緒十二年間的秋天。那时，富阳县何家、馭里村一带，遭受了特大的洪涝灾害，很多地方顆粒无收。災后，官府和地主们向农民强收田稅，强收租粮。村里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，就同邻近的唐华、五保、凌家、商元头等村的农民联合起来，推选了貧农何根来等数十人为代表，上县請求減免田稅、地租，发放救济粮。县官綽号叫“何

草包”，是个大地主。他不但不准农民的請求，反用“吵鬧公堂”的罪名，将全体請愿农民打入监牢。事后，还用老虎凳、跪紅砖头等苦肉刑，威逼农民认“罪”，判处死刑。后来，前去請愿的农民虽被營救出来，但是官府、地主的錢粮、地租仍要如数补交。农民们有苦无处訴，只得借着編写和演出“洪荒图”的戏，来揭露官府、地主的罪恶，出出胸中的气。现在我们再看看国民党反动政府統治时期，农民杨立貝三次告状的事吧。临安县藻溪董家村农民杨立貝，因为受不了当地恶霸地主吳文执的仗势夺田的种种欺压，曾經向国民党的大大小的法院告过三次状：第一次，他把状紙告到于潛县伪法院。伪法官早被吳文执用錢买通了。他们不問青紅皂白，把杨立貝夫妻二人严刑拷打，关进了監獄。一个多月后，才化錢央人保出。第二次告到杭州伪高等法院，伪法官也是和地主一鼻孔出气。他们把杨立貝騙回家去后，又立即派出軍警赶到杨家，抓走了杨立貝，把他一家人打得鮮血淋淋。地主吳文执还仗势搶走了杨家的东西，放火烧掉了他家的草屋。杨立貝含冤不服，第三次，又和妻子一路討飯到南京，告到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。法院也将杨立貝打得头破血流，一推了事。杨立貝三次告状，受尽了官府、地主的种种追

害，弄得家破人亡。最后，杨立貝才看清了国民党官府的反动本质，什么法律、衙門，全都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……。

杨立貝的遭遇，杨立貝的冤仇，也就是旧社会千万农民的遭遇，千万农民的冤仇。杨立貝含冤負屈二十多年，直到解放以后，才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向自己的政府告准了这个状，报了这血海深仇。

“告不行，那就反，同他们拼！”这话是说对了。我们浙江各地农民自发地起来，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如绍兴任家畝的农民因为受不了恶霸地主“六老虎”的迫害，几十个农民曾自发地组织起来，攻进“老虎窝”，围捕“六老虎”。当时，没有来得及逃跑的“三老虎、阴司秀才”任应定，被农民任伯云等抓住，愤怒地挖掉了眼睛，有力地打击了“六老虎”的凶恶气焰。全省各地农民的这种反抗斗争，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，鼓舞了农民的斗志，教育了劳动人民，推动了阶级斗争的发展。但是，在旧社会里，地主阶级有着军队、警察、法院、监狱等等反革命工具作靠山，农民要是没有党的正确领导，就不能彻底打垮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权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而且，还会受到地主阶



农民们串连起来，攻进“老虎窝”，剿捕“六老虎”。

級和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。如武义县白溪公社童芦大队的农民，解放前因为荒年交不起重租重赋，受不了官府、地主和反动军警的催逼，苦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百多个农民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反抗。他们到当地大恶霸地主童望祧家“吃大户”。在一场斗争中，他们用土枪打死了童望祧这只恶虎。当这场斗争的风声一过，童望祧的儿子童维梓、童朝中等地主立即串通官府，带来了大批“官兵”，进行残酷的镇压。一时里弄得几百里村庄都鸡飞狗上屋。许多农民被关进了监狱。

“当佃户，做长工多么苦！天下那么大，为什么不逃呢？”这是我们有些青年同志的又一种天真的想法。要知道，在还没有党所开辟的解放区以前，全中国都在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，各个地方的土地都被地主霸占着。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，东山老虎要吃人，西山老虎也是要吃人的。在旧社会有许多农民兄弟，在当地活不下去了，就从南方逃到北方，或者从北方跑到南方，但正如俗话说的：

“逃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庙”，仍然逃不出反动的剥削制度，逃不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。黄岩县横街公社洋屿大队党支部书记尚伯舜，解放前，曾经从家乡逃到金清，从金清又逃到宁波。在金清是在伪保长的家里做长工。在宁

波也只得到处給地主做长工。他在地主家苦苦熬过了十七年，家里还是穷得連把火叉也买不起。

利用封建迷信 欺騙毒害人民

剝削階級除了用上面种种强迫手段，压迫劳动人民外，还同时从思想文化上对劳动人民进行欺騙，实行“愚民政策”。一方面，不准人民有言論、出版、集会等自由，控制人民的思想；另一方面，又通过反动的教育制度和各种宣传工具，利用迎神、賽会、演戏、算命、測字等封建迷信，传布各种反动思想，从精神上、思想上来毒害、麻醉劳动人民。地主階級利用学校、书报等工具散布什么：私有制是天經地义，神圣不可侵犯的；不是农民养活地主，而是农民离开了地主就活不了。提倡万般皆下品，只有讀書高，輕視体力劳动，輕視劳动人民。千百年来，地主階級还用造貞节牌坊，立家规、族规等欺騙手段，向劳动人民灌輸封建礼教。要劳动人民“忠实”地服从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。还要妇女遵守“在家从父、出嫁从夫、夫死从子”等所謂“三从四德”。

利用宗教、封建迷信和反动道会門来害人，是地主階級欺騙、麻醉劳动人民的又一种阴險手法。在旧社会里，

地主階級常常通過塑菩薩、修廟宇，策動農民迎神、賽會、看風水、算命、測字，編演因果報应的戲文等等方式，到處傳布“生死由命，富貴在天”，“萬事無須人用功，一生自有天作主”等鬼話。說什麼窮人所以受苦受難，是因為“前世不修，這世吃苦”；象他們那樣坐坐吃吃、享樂腐化，是前世修來的。農民反抗了財主，到“陰間”就要入“地獄”，上刀山，下油鍋，來世還要給他們作牛作馬還債……。解放以前，有的農民就因為受了這種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，真以為自己受苦受難是“前世不修，今世報应”，以為地主有財有勢是他們“命”好，所以他們只得自嘆“命”苦。其實這是上了地主階級的當。

此外，有的地主還利用“一貫道”“九宮道”“同善社”等反動道會門來害人。他們把農民騙進了這些反動道會門組織，用一套反動的“道規”“會章”來牽着“會員”的鼻子，要“會員”充當他們的爪牙，幫着他們行凶作惡。有些農民被騙加入了“一貫道”，還被“壇主”榨去了不少錢物。有的婦女甚至遭到“點禪師”的奸污，真是有苦難言。

地主階級不甘心死亡

紅旗一展換人間， 掙斷千年鐵鎖鏈，
地主階級心不死， 时时刻刻想變天。

“想想過去，看看現在，真是換了人間”。這話一點也不錯。

舊社會是地主的天堂，農民的地獄。在今天新社會里，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，執政當權，成了國家的主人。並且愉快地勞動、工作和學習，過着一天比一天好的生活。地主階級不但不能再騎在人民頭上，作威作福，花天酒地，而且，在他們還沒有從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以前，不給他們選舉權，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，只准他們老老实實，不許他們亂說亂動。這真是天翻地復，換了人間。

但是，青年同志們！當我們生活越過越美的時候，可千萬不能忘記；被打倒的地主階級是不會忘記他們過去的

甜蜜生活，甘心失去他们的“天堂”的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说过：“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。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，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，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。”又说：“……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，就以十倍的努力、疯狂的热情、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，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‘天堂’，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、现在却被‘平凡的贱民’弄得贫困破产（或者从事‘平凡的’劳动……）的家庭。”

毛主席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：“……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，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。在全国平定以后，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，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。这是必然的，毫无疑问的，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。”

解放后，十多年来的事实，完全证实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是十分正确的。

在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、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，农村的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，曾经用各种各样的恶毒手段，进行垂死挣扎。他们造谣、威胁，说什么“共产党长不了，今天分我田的，将来



这是“活阎王”邵展成埋藏在地窖里的白桦林手枪。

要用头来还。”“办社是关门养蛇，蛇大就要咬人。”

“合作社搞糟了，办社是好了国家，苦煞农民。”等等。企图挑起农民对国家和合作社的不满。有的地主甚至暗地里记下了“复辟帐”和“黑名单”，梦想等待“变天”。

有的就用破坏农具，毒死害死耕畜，水淹庄稼，毁坏山林，用坏种偷换好种，纵火暗杀等阴险手段，杀害干部和积极分子，破坏农业生产。更狡猾的是，他们还串同富

农等农村资本主义残余势力，办假互助组、假合作社，同合作社唱对台戏，拆合作社的台。有些地主、富农甚至假装积极，两面三刀，混进互助组和合作社，篡夺了会计、记工员等职务，从中歪曲党的政策，挑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，煽动小部分落后群众闹社、退社。

当然，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。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，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。提高了社员的阶级觉悟，认清了方向，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。

那末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同我们经过几次较量，受到几次打击以后，是不是就肯认输了呢？不，正如俗语说的：狼总是要吃人的。他们对党、对新社会、对人民公社，仍然抱着刻骨仇恨，一有机会，就想反扑。而且他们破坏的手法也更阴险、更隐蔽了。硬的不行，来软的；明的不行，来暗的；辣的不行，来甜的。

例如，到处宣扬地主、资本家的腐朽的生活方式，和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的反动人生观；以出借图书为名，用各种反动淫秽的旧小说、旧报刊来腐蚀干部和青年的革命思想，引诱你腐化堕落；有的地主，借婚丧喜事为名，向干部请酒送礼，或者和干部攀亲结眷，把你拉下水。

有些地方的地主还利用修家譜、修宗祠等方法来欺騙拉攏一小部分落后群众，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統治，或者和富农、坏分子、反革命分子串通起来，利用宗教、迷信和反动会道門，暗地里发展反革命組織，进行反革命活动。

同志们，請想一想，地主階級的这些手段是多么阴險，多么毒辣！

但是，有少数青年同志认为：“现在是新社会，大家都一样，靠劳动吃飯，按劳分配，还分啥地主、富农。”

“旧社会地主坏，现在他们都老实听话了。”等等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。許多事实告訴我们：只要社会上还有階級，就一定有階級斗争。的确，地主階級已經打倒了，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經消灭了，但是地主階級的残余势力还存在，地主階級的影响还存在，而且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，地主階級的残余势力搞反攻复辟的花样也越来越多。所以，我们还要时刻警惕，决不能有絲毫輕敌麻痹思想。如果还认为：“现在已經太太平平、无妖无怪，地主老实听话了”，那就要受階級敌人的暗算，上大当、吃大亏。真是：“酒色財气惑人心，修譜建祠搞迷信，警惕地主还魂計，心坚如铁为革命。”

牢記階級仇恨 把革命進行到底

同志們，地主階級的罪惡是數不盡、說不完的。地主階級被打倒以後，是不甘心死亡的，他們時刻都在妄想恢復他們的“天堂”。所以，我們千萬不能忘記父兄的苦難，千萬不能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，時時刻刻都要提高警惕，高舉革命紅旗，把革命進行到底。

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廣大青年在政治思想上的成長是很快的。但是也有少數青年，對現實生活中的階級鬥爭認識不足，警惕性不高，沾染上了一些剝削階級的思想。例如有些青年認為，現在革命勝利了，應該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享享福了，為什麼生活還過得不很富裕，這種想法是不對頭的。

是的，我們鬧革命，搞建設，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發展生產，使人民生活越過越美好。事實上，解放以後，勞動人民不僅在政治上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，而且隨着國家

建設的發展，生活也有了顯著改善。黃岩縣焦坑公社涼棚嶺生產大隊社員葉根土的一家，就是一例。剛解放時，他一家人生活還很苦：“老大（女兒桂鳳）穿的是‘百納衣’，老二（他兒子）穿的是‘花子衫’，七搭八挂草繩系，還得用手把它牽。”現在是“看看舊模樣，全是化子相，轉眼十年間，地獄變天堂。”再從樂清縣中雁山下的霓岙來看：十四年前，這裡一百四十二戶農民，除去二戶中農，全是佃戶和長工。很多農民靠求乞度日。隨着生產的發展（解放前每畝水稻的平均產量不到四百斤，一九六二年達到八百二十斤），過去那種“日吃野樹皮，夜蓋破蓑衣”的窮困生活已經一去不回了，大部分農民都是豐衣足食，過着“灌田抽水機，割稻打稻機；大人勤生產，兒童勤學習；吃穿不用愁，臉上笑嘻嘻”的好日子。解放前後，兩種生活相比，真是一個天上，一個地下。對今天的生活還不滿意，那就是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，忘了本。

當然，反過來，滿足於現狀，躺下來不再向前走，不革命了，那就更錯誤了。我們應當看到，由於三大敵人黑暗統治的結果，舊中國遺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破破爛爛的攤子。我們是在“一窮二白”的基礎上建設國家的。今天，這種落后面貌還沒有完全改變。加上自然災害的侵襲，我

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算很好。要改变这种情形，必須在党的领导下，树雄心，立壮志，发扬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、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，迅速地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。生产发展了，国家富强了，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。

青年同志们，千万别认为光想吃得好、穿得好、享享福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要知道，光讲吃、穿，不想勤俭节约，只讲享福，不想艰苦，这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。地主、资产阶级不劳动，不知一丝一缕来得不易，一粥一饭粒粒辛苦。他们专靠剥削别人劳动果实，供自己享受，过惯了花天酒地、好吃懒做的生活。所以只有他们，才光想吃得好、穿得好，不知勤俭节约，光想享福，不想劳动。因此，这种思想不及时克服，是十分危险的。

还有少数青年人，看不起体力劳动，认为农民劳动很辛苦，又没有多大“出息”。这种思想也是不对的。

劳动，是很辛苦的。但是，我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是哪里来的呢？没有那一样不是劳动创造的。我们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，也是要通过辛勤的劳动实现的。所以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劳动，特别是农业劳动，已经成为光荣豪迈的事业。有许多青年参加农业劳动后，体会到：农业劳

动晒黑皮肤炼红了心，看到了用自己的双手生产出来的稻谷和棉花，想到自己是在农业战线上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时候，就觉得农村就是广阔的天地，农业劳动就是光荣的事业。“海阔任鱼跃，天空凭鸟飞”，农业劳动是大有前途，最有出息的。只有那些靠别人血汗来养活自己的地主、资产阶级，才怕体力劳动，怕农业劳动。也只有他们，才把创造世界的劳动人民，看做是最下贱、最呆笨的人，认为参加体力劳动、当农民，是下贱的事情。青年同志们，要警惕呵！

还有些人说：“集体的东西多一点、少一点，摊到自己身上并没有多少。”“三三四四杀头牛，不如一人杀只狗。”“搞点家庭副业，做点生意挣点钱是最实惠的。”这种自私自利思想，更是要不得。

要知道，在我们的国家里，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。水涨船高。今天我们的国家，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。我们的人民公社是社员的大家庭。只有国家富强了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发展了，才能“大河有水小河满”，社员才能不断增加收入，永远摆脱剥削和贫困，过共同富裕的好日子。我们今天把集体生产搞好，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我们关心集体，为集体多

出一分力，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富强和后代的幸福。从这一点着眼，我们就不能說集体的事情分到我们社員身上是很“微細”的。桐庐县桐君公社梅蓉大队，解放前是：“十里洋，九里洲，庄稼十年九无收，米桶一年空到头，有女不嫁九里洲。”集体化以来，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来，社員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，依靠集体經濟的优越性，改变了荒洲的落后面貌，把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。一九六二年，全队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五十一万三千斤，平均亩产一千斤。果木收入达到七万四千多元。猪羊全年飼养数达到平均每戶二点四头。平均每戶收入四百九十六元，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以上。全大队有一半以上的农户装上了电灯，大部分社員有了存粮和存款。大家都說：魚离开水不能活，我们离开了国家，离开了人民公社不能过共同富裕的生活。

有自私自利思想的人，就会不知不觉地走上个人发家的邪路。这条道路是不是走得通呢？解放以前和土地改革以后的許多慘痛教訓告訴我们，个人发家的道路，就是一条少数人发财、多数人貧困破产的道路。解放以前，千百万农民曾想用自己的劳动，使生活过得好一点，可是結果总是逃不出穷困破产的折磨，成年累月，掙扎在死亡綫

上。土地改革以后，有少数人也曾經走过一段单干的道路，可是他们得到的深刻教訓是：小农經濟身单力薄，难以抗拒天災人禍，难以按照国家的計划要求发展生产，难以保障收入的不断提高，更难避免两极分化。那时候，有的农民就因为碰上天災人禍无法抗拒，所以又不得不借債、卖田……，少数人投机取巧賺了錢，又在放債、买田……，从中盘剝別人。走个人发家的老路，走到头来，农民就会丧田失地，使剝削制度会死灰复燃，剝削階級又会在农村里复辟。階級敌人所以要通过种种阴险手法，用自私自利的思想毒素来腐蝕我们青年，就是为了实现他们复辟的妄想。

因此，我们每个青年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坚定无产階級的立场，提高革命警惕性，克服各种錯誤思想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要做到这样，就要从以下两方面努力：一方面，必須結合实践斗争，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，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，指导我们进行階級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。另一方面，应该积极参加建設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大革命运动。就当前來說，必須积极投身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。从这种现实的斗争中，去經受鍛煉和考驗。許多青年人的切身体会告訴

我们：亲身参加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去，并且通过看展览，访贫问苦，读社史、村史、家史等活动，就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旧社会，什么叫剥削，什么叫阶级和阶级斗争。参加生产斗争，积极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，积极进行维护国家和集体事业的活动，也是提高阶级觉悟、改造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。通过参加集体劳动和爱护国家和集体事业的活动，能够使我们保持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、艰苦朴素、先公后私、爱国爱集体的美德，更好地防止贪图享受、好逸恶劳、损公利私等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，使自己的思想逐步革命化，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，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，把革命进行到底。